

## 诗学与诗歌史研究(之二)

## 主持人语

百年学术,开古人未有之局。整体上是新的,也应该是新的。但古代文学尤其是诗学领域,与别的学科有很大的不同。昔冯友兰论中国哲学史学科,曾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揭示其述古与开新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然百年学术,窃以为维新之义突出,而于述古则有所不及。古人论学,每重“述”之一义,孔子“述而不作”,已含此深义。清人汪中以“述学”名其集,亦此义也。盖述古之精确,即开新也。本此义以观百年学术,述古之精者果亦有之,而误解古人,甚至厚诬古人者,实亦不鲜。

本期栏目所发表的三篇论文,主要有关于诗学与诗歌史的研究史方面论题。齐益寿先生的论文,从中国古代诗教的传承这一角度来评论叶嘉莹先生在诗词创作、研究与教学方面的贡献。笔者曾以诗学统摄诗歌史与诗歌理论批评史,齐先生则以“诗教”一词归纳自先秦至今的诗学传承,立意尤为宏大。浅见以为此文的价值有这样四个方面:一、于周代诗教三期演进,揭示至当,而尤于孔氏诗教之意义阐发至深,揭万古人诗之源头。这样论诗教进程,为前人所少见。二、分别诗教与诗论之两大阶段为“用诗”与“作诗”,如此揭示,为诗歌史与诗歌批评史揭出一新纲领,可谓高瞻远瞩。三、论叶嘉莹之诗心诗艺,多今人所未及。叶嘉莹先生诗情浓郁、诗笔新活,在继承古典诗艺之同时,确有现代性之发展。四、论迦陵诗论、诗教之贡献,其中具有亲聆者之经验,非旁观者所及。刘青海君一文,以蔡宗齐《比较诗学研究》为例,具体地展示比较诗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是本书译者,与蔡先生交流甚多,所以不是一般意义的书评。蔡宗齐《比较诗学研究》尝试建立一个贯通全史的中西诗学的比较结构,而于中国古典诗学的奥义亦多所抉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诗学是诗学与诗歌史研究史中不可缺少的。诗学与诗歌史研究最宏伟的目标,自然是贯通古今中西,以求诗学之通义,诗史之通例。“通”为学之要义,学之大小,即通之广狭。然而如何进行比较诗学的研究,从何找到汇通之点,是值得思考的。

五六十代的学术史,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时不能回避的段落。笔者近年从事20世纪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史的撰写,深切地感觉到这一段学术史的复杂性,而今人之评价,褒贬或有失当。因尝试为此,亦立意于提出问题,非敢自视为定论。

本栏目三篇论文,各自都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同仁的关注与讨论。

——钱志熙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初步评述

钱志熙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是20世纪前半期学术发展态势在新的政治与学术体制中的延续,在研究者群体自身定位与学术生产方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具体的学术内容上,也继承上半期的许多具体观点,但被纳入到阶级分析、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等比较凝固的模式中,仍然显示出新旧交汇的复杂的情况;同时新文学派完全成为主流,并且鲁迅的经典地位被确立。剔除此期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的因素,在具体的诗人与诗歌作品的研究方面,仍有许多实质性的推进,并且为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奠定了一些基础。

**关键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学术生产方式;研究者群体自身定位

中图分类号:I 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047-12

作为 20 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部分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其基本格局是在 20 世纪上半期奠定的。我在《旧学与新知的复杂交汇——试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汉魏六朝诗歌史研究》<sup>①</sup>、《20 世纪上半期乐府研究史述评》<sup>②</sup> 两篇论文里尝试对其作学术史的建构。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 20 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则是一个颇具特殊性的时期,政治与新的学术体制、学术传统等各种合力,形成了这个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复杂态势。单纯从形态上说,称之为开新之局或变异之态,许之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全面使用,或评之为庸俗社会学的流行,似乎都有各自的理由。这些复杂的问题,有待于学术界的讨论。无论怎样评价,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两个学术高峰之间,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以其特殊的方式完成了学术上承前启后的转变。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藉以明瞭今后学术发展的方向。魏晋南北朝诗歌史,因其学术内容较集中、研究传统较深厚以及意识倾向明显等原因,向来易被各种文学观念影响;也是漫长的中国古代诗歌史中较易被迅速建构的一段历史。所以梳理五、六十年代学术形态中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作为研究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学的一种个案。

# 一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从学术自身的发展态势来看,仍是 20 世纪前半期学术的延续,却是在新的政治体制、学术体制与意识形态背景中延续的。新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环境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学界比较多地看到的,虽然问题本身仍有很大的探讨空间。而五六十年代新的政治体制建立后形成的学术体制对本段及

此后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似乎未被文学史的学者注意。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工作规范,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学教学体制,在系科设置方面,中文系的设置更加明确,称汉语言文学系或中国语言文学系。在研究机构的设置方面,五六十年代开始,设立科学院(后分社会科学院)下属的文学研究所及各种文学研究室。在出版方面,各出版社也有规范的文学室的设立。上述体制的整齐划一化,似乎使古代文学研究者有了更明确的分工意识,有一批固定的、可明确统计的从业人员。学术体制的这种变化,也带来学者治学方式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学者,有文史哲及古今中外等方面的各自专攻方向,但是常常并不严格。即以古典专业的学者来看,常常是文史哲不分,这种情况也许更接近自然的学术生态。但进入新中国之后,由于在学术体制方面的更加专业化,学者们都经历了一番对自己专业的重新定位,并以此定位来规范他们的学术与教学。例如,著名的词学家夏承焘,前期学术兴趣广泛,对史学与理学都有过研究计划,其教学方面涉及的对象也较广,进入五十年代后,则完全集中到以词学为主攻方向的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方面。<sup>③</sup>又如兼攻文史的缪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河南大学、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华西大学历史系与中文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则先是任人民华西大学历史系主任,后来一直任四川大学历史教授。<sup>④</sup>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老一辈学者中不在少数,也包括一部分原本同时从事新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进入五六十年代后选择以古典文学研究为主要的工作。“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成了本学科从事者的一种身份定位。中文系文学专业内部各教研室的划分以及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研究方向的分工,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同于过去

收稿日期:2014-02-28

作者简介:钱志熙,男,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文艺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 期。

② 《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5 期。

③ 参看钱志熙《夏承焘先生早年学术道路试探》,《中文学术前沿》第 5 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2 页。

④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冰茧彩丝集》,附录一“缪钺教授自传”,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71 页。

的新的学术体制。也许可以说,进入新中国以后,我们今天常说的古代文学学科,才真正明确起来,而专攻方向的明确化,更使这个时期的人才由新中国成立前以通才为主向专家型发展。所以,我们思考或研究1949年以后的古代文学研究史,似乎不能不注意到上述学术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学术上相应的变化。其利弊不易一言以述之。直观的印象是,民国时代的学者,虽然术业有专攻的意识也十分明确,但还没有形成此后的分工体制,所以学问上以博通为特点,但专精或有所不足;五六十年代以后的大陆地区学者,分工意识很明确,学问上以专精为特点,但博通不够,多有局限。这种情况,在此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辈学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

另一个学术体制的变化,是学术工作的形式。民国时代的学术,基本上是个体式,同时学术的生产也主要是个体化的,充分体现学术上的个性化与学术自由的原则。比如民国时期产生的数量颇多的各种文学史,多是个人著述。进入五十年代后,有组织的集体研究、集体编纂,成为学术工作的主要方式。当时的重要学者,鲜有完全不被集体制的学术生产方式卷入其中的,五六十年代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一辈学者,更是直接地从集体制学术生产方式中培养出来的。要较好地把握20世纪后半期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史,尤其是寻找其与前半期的不同,上述学术体制变化的背景,似乎也应该加以注意。这种集体制学术生产方式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前言》对当时学术活动的情况有所记载:

毛主席曾经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大跃进以来,在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波澜壮阔的文化革命也把我国的科学文化推到了飞跃发展的大道。文学史的研究,一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十分重大的。好几部集体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先后出版了,对古典作家作品进入深入研究的专篇论文,也比

过去更加多了。近半年来,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多次座谈会,请了许多著名学者和各方面代表就文学史的若干基本问题发表了意见,报刊也就文学史的研究,展开极其热烈的自由争论。因而,许多去年不曾认识到的、认识不深刻的或者有错误的问题,逐渐被澄清了。这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可喜的收获,我们的文学史理应反映这种学术发展的最新成就。<sup>①</sup>

这里所叙述的学术讨论情况,在当时是具有普遍性的。中性地看待这种现象,我们不能不承认,五六十年代的学术生产方式,也与当时的整个生产方式一样,是高度的集体制的。文学史、较大规模的历代或通代文学作品选的集体编纂方式,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成果。这种编写方式,一直延续到八九十年代,至今仍为流行的模式。可以说是,这五六十年代奠定的一种学术生产方式。这种模式的利弊是值得研究的。但其中学术个性、学者创新意识的减弱,当是不争的事实。

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文艺思想体系的建立期。这个文艺思想体系的建立,以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以国家当时重要的政治政策和一系列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为主要的背景,以十七年中发生的具体的文学事件为主要内容而展开的。<sup>②</sup>由此引起许多文学方面的争鸣与争议。它主要是以当代文艺为主的,但也同样波及古代文学领域。在“百家争鸣”的政治口号下,一种旨在以新中国文艺思想体系为旨归的学术争鸣,同样在古代文学领域中展开,其中比较集中的表现,就是有关建安风骨发生的现实背景与具体内涵,有关曹操、陶渊明等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作品的现实性、人民性等论题的讨论。这种争议,虽然是以共同的文艺思想如批判现实主义、积极浪漫主义等艺术标准为旨归,其中也体现了不同研究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审美趣味的差别。但总的来说,这些争论,就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史而言,有效的学术积累是比较少的。这种争鸣其实也可以视为五六十年代学术研究的集体生产方式的一种表现。

①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页。

② 上述问题,近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

## 二

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模式,可以概括为下述诸点:

(一)重视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的分析。古代形态的文学史论,有重视社会现实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传统。班固《汉书·艺文志》论“贤人失志之赋”,以及《毛诗·大序》论变风变雅,都是从社会现实的变化来分析某些具体的文学现象的成因。刘勰《文心雕龙》继承汉儒文论的传统,并且提出“时序”这个范畴,建立了一种整体地把握历史变迁与文学发展的对应关系的研究方式。其《时序》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学文学批评方法的典范。但是,唐宋以来形成的不计其数的文学史论,总体上看,是侧重文体学、风格学的,社会学方法的使用不太多。20 世纪前半期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较多地关注魏晋时代的历史特点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对于门阀政治、玄学、佛学等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有一定的关注,但并未形成凝固的叙述模式。这个模式在八九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仍有相当大的制约力,其形成则在五六十年代。在叙述的内容上,总是首先强调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黑暗、分裂的历史阶段特征。具体的例子如:“从汉末大乱到隋代统一,历时约四百年。我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与动荡不安的状态,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sup>①</sup>“自 189 年汉末董卓之乱,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 581 年隋统一全国,约四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进入了长期的混乱、分裂状态,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黑暗、动荡时期。在这一时期里,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极为深重的。”<sup>②</sup>这种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分裂、黑暗的整体看法,在后面时期的研究中仍有相当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论中,就有认为变风、变雅为现实衰乱之产物的看法,可谓上述分析方法的本土传统资源。但在思考方式中,马克思在论古希腊神话等文学现象时

提出的文艺与历史发展不平衡的观点,似乎有更大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政治上存在的某些负面情况与文学发展的复杂关系,的确是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不加分析地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定性为黑暗、混乱,并以此为文学产生的背景,并不利于我们认识文学创作中复杂、丰富的背景,其方法显然有简单化之嫌。上举两种文学史中,相比之下,前一种文学史强调此种分析方法,强调此阶段“历史情况复杂,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还不失为客观、有效的学术观点。与此相关,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统治阶层在政治上是非功过的评价,也是整体加以否定的。对其在政治上的建树很少肯定,仅对曹魏的评价有所例外。这深受当时政治上正反两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也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现实政治中阶级成分论在古代历史与文学研究中的反映。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在文化上是具有一定的建树功能的。如统治阶级对文学的提倡、各种文化及学术对文学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此期的文学史较少涉及。同样,此期作家群体阶层情况的复杂性,在此期的文学史叙述中也多被忽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是在下一个学术时期展开的。

(二)阶级分析方法的普遍使用。在“大跃进”期间或稍后编著的文学史,主要采取阶级分析和文化批判的方法。其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时,着重地描述这个时期政治上的黑暗,门阀士族阶层的腐败。与之相应的是,对作为此期政治之产物的玄学及形式主义、绮靡风格的文学创作,也基本上是以批判的笔调来叙述的。同时,为了给这个时期诸如建安诗歌、阮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经典性作品的成因做出解释,当时的通行方式,是采取将上述文学家群体及个人阐释为统治阶级中新兴的、持批判性的中下阶层。上述经典作家的阶层属性与其创作的关系是存在,但是本时期撰述的文学史,显然是将上述历史事实夸张并完全简单化了。<sup>③</sup>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95 页。

② 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中国文学史稿》,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1 页。

③ 以上观点主要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吉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小组编著《中国文学史稿》两书。

阶级分析的方法主要来自于历史唯物主义,在三四十年代就已流行。但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有带有派性、主观色彩和比较客观的分析这两类。人类社会存在着阶层与阶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一切的文化与文学现象中都可能含有阶层性与阶级性的问题,也是整体上能够成立的想法。但是阶级、阶层并非人类唯一的归属形式,其他如国家、族群、地域等,同样是人类的重要归属形式。但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叙述,阶级分析差不多成了唯一的方法。这样就显示出它的偏差来了。具体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当时社会中存在着门阀士族、庶族或寒素族等多种阶层,也是自来为历史学家所关注的。古代史学对此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如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卷十五“高门士女”等条<sup>①</sup>。20世纪的新史学家如吕思勉、陈寅恪等对此更多研究。1947年至1948年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讲述魏晋南北朝史,所贯穿的就是阶级分析与集团分析的方法<sup>②</sup>,将曹氏与司马氏分别归属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并且认为魏晋政治更替的实质为儒家豪族取代非儒家寒族。而将东晋的南北士族称“文化高门”,更是陈氏的重要观点。可见,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有关研究,在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时,相当大的程度上采用了当时被称为解放前资产阶级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学术嬗变中新与旧复杂交织的情况。但是,五六十年代的阶级分析方法,由于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显得简单化与标签化。尤其是在判定作家群体与个体的成分这一点上,受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实行的成分分析的影响很明显。尤其是滥用“地主阶级”这个概念,使得这个时期的文人群体总体上被判定为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而这在当时的价值评价标准中是被否定的。这掩盖了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方面的多样性、复杂性的事实。作为一个补充的方法,则是根据统治阶级内部阶层的不同,区别为腐朽、反动的与具有进步、新兴色彩的两种,在

地主阶级内部再分统治、压迫阶级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这方面的内容当然是大量地接受了古代与20世纪上半期历史研究中对门阀政治、门阀士族阶层的研究成果,但带有浓厚的褒贬色彩。直到今天,摆脱派性和当下的政治目的,文人群体比较客观的阶层性研究,仍应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甚至可以说,这个课题真正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今后的学术界。

(三)诗歌史演变的叙述。接受上半期对汉魏六朝乐府民歌研究的成就,以及上半期已经作出的建安等时期的文人诗是从乐府民歌中发展过来的判断,主要研究文人如何接受民间诗歌的影响。前半期的三四十年代,已经突破五四时期片面肯定民间诗歌的倾向,对文人在接受民间诗歌的基础上所作出的发展给予了肯定。这一成果,在这个时期也巩固下来的。尤其是曹植、阮籍、陶渊明、鲍照等几个大诗人,较上半期受到更多的关注。无论是使用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分析方法,还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些诗人都被列入正面性的叙述中。在艺术评价方面,更是差不多完全是正面性的。从上半期的重视文学史建构、重视诗歌史的宏观视野,转变为本期以大诗人、重要诗人为主的研究。所以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重要诗人研究。这当然与传统观念有关系。中国古代的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本来就主要是经典的接受与评论。

### 三

五六十年文学史研究标志性的集体成果,首推1962年出版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1963年出版的北大等高校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它们可以说是大跃进时期文学史编写热的一个持续性的成果,其中也带有纠偏的性质。也许可以这样为这两部及与此同期产生的各种集体撰写的文学史定位:它们是在新的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中对20世纪初以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作了一个集成性的阐述。在评价其得失的时候,不能忘记它们与20世纪前半期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8、174、215页。

② 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页。

学术的紧密联系。担纲这两部文学史中魏晋南北朝部分的主笔,在文学所方面是余冠英,在高校方面则是萧涤非。他们正是在四十年代登上学术舞台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尤其是乐府诗研究方面的资深学者。仅此一点,也可见它们与前半期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之间有不能割断的联系。余冠英 1951 年 8 月撰写的《建安代表诗人曹植》、1956 年撰写的《三曹诗选前言》、1958 年撰写的《汉魏六朝诗选前言》等论文,是本期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的代表性著述。这些文章也确立了五六十年代,甚至更后一些时期叙述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基本框架。其在叙述建安诗歌的发展时,强调儒学的衰微对文学、民间歌谣的影响这些基本因素,同时吸取前期史学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阶层研究的成果,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作家的阶级性问题,以及与文学的关系。如认为曹魏所代表的是与汉末大地主集团不同的一个新兴阶层,这个“集团所产生的文学有共同的特征,显出相当的进步性。曹植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从他的作品就可以见出那时代文学的特征与进步性”。<sup>①</sup> 他分析袁绍与曹操各自代表士族与非士族两个阶层,曹魏的轻经术、重文学,就是新兴的非士族阶层的一种表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把握建安乃至魏晋文人五言诗兴起的原因,对后来研究的影响相当大。又如指出建安时代是诗歌取代辞赋成为主流文体,同时建安诗歌也受到辞赋的影响,也继承了前期的一些观点,成为后来考察魏晋诗歌成因的一个角度。从余氏上述三篇论文,我们仍可以看到,传统的文学史观点、上半期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的一些新知以及五十年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比较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也构成后来的科学院版《中国文学史》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余氏对这个时期走上学术舞台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的年轻一辈学者,也有直接的启

迪与引导作用。

科学院版《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思想对文学的影响,它将本段文学史主要分为“汉魏之际”、“魏末晋代”、“南朝”、“北朝”这样的几个时期,对于每时期的社会政治及思想的基本情况都有一个比较概括的叙述。这种重视社会政治及思想背景的研究方法,无疑是继承了前半期中以刘师培、鲁迅为代表的研究方法,从更远的渊源来看,当然也继承了以刘勰为代表的南朝文史家的方法。刘勰在《时序》篇中即说“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sup>②</sup> 但是这部文学史在具体的观点上更多地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对建安文学的介绍,认为在汉末大乱中大官僚贵族的统治集团被削弱打击,曹操等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阶层取得一定的地位。认为“曹操和他的集团不但在政治上代表中小地主的利益,而且在文学上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艺术趣味”<sup>③</sup>。同样,在分析两晋文学风气时,注重的也是门阀政治与玄虚之风等政治及思想背景的影响。

“现实性”与“形式主义”是当时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关键词。在梳理魏晋南北朝诗歌史时,这对概念更是起到整体的构建作用。将现实主义、形式主义等概念与阶级分析的方法相结合,更是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特点。一般说来,代表着中小地主阶层利益的建安文学,以及此后寒素阶层的文学家如左思、陶渊明、鲍照,他们在文学上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现实性;与之相对的代表贵族阶级的两晋、南朝的不乏文学家,则多趋向于“形式主义”。如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认为西晋士族是一个非常腐朽的阶级,但垄断了文化。在他们的把持下,文学离开了“建安风骨”的传统,很少反映社会现实,主要成了表现士族阶级狭隘思想感情与不健康艺术趣味的工具,同时

① 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建安代表诗人曹植”,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据中华书局 1962 年版排印,第 66 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詹鍈:《文心雕龙义证》,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713 页。

③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第 1 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187 页。

形式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但出身寒微的左思继承了建安风骨。<sup>①</sup>“历代作家常把建安看作文学的黄金时代,他们在反对绮靡柔弱的形式主义文风和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时,往往提出建安作品作为效法的典范。唐代陈子昂的提倡‘汉魏风骨’就是最好的例子。”<sup>②</sup>这种判断的方法,无疑与传统的崇尚汉魏风骨、认为晋宋以后文学风气转向雕琢、绮縠的观点有共同的地方,与“汉魏风骨”说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其中使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及“现实性”“形式主义”两个概念和二元式的艺术批评方法,却并非古人所有。从这里我们看到古今文学史观、文学史范畴之间的微妙嬗替。在分析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也主要使用上述的范畴和方法,如论曹操“《蒿里行》就是当时现实的生动的缩影”<sup>③</sup>、阮籍《咏怀诗》第三十一首是借古喻今,写的都是“魏末晋初的现实”<sup>④</sup>。而在分析作家创作精神的动因时,如对阮籍、左思、陶渊明等人的分析,无一例外地指出其“不满于现实”这一点,或因不满现实而生批判的精神,或因不满现实而生逃避的思想,从而决定其作品在表现现实方面的不同方式及成就的高低。

游国恩等五位学者主编的高校版《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部分主要由萧涤非负责。萧氏师从黄节,是三四十年代学院派乐府诗研究的中坚。其对乐府的研究,基本上采取传统的文学与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黄节对其有很高的评价。解放以后,萧氏是主流学者,研究方法有较大的转变。这部《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在叙述方式上,同样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使用“现实性”“形式主义”等批评范畴。在本编的《概述》中,对于建安、正始、两晋、南朝、北朝各个时期的政治现实与文学关系作了系统的叙述。但在具体观点上,相对来说趋于平允,比较贴近历史事实。如强调汉末社会巨大变动引起思想方面的变化,名、法、兵、纵横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

展,思想界呈现自由解放的趋势,并以此作为建安文学形成新面貌的一种背景。又如指出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提高,文学批评风气出现,表现出文学自觉的精神。在叙述玄学背景时,注重其与魏晋之际曹魏与司马氏两个集团之间的现实政治斗争的关系,并且也认为这两个集团代表不同的阶层利益。

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现实性、形式主义的评价标准,以及将此标准与阶级分析方法的结合,可以说是当时普遍使用的方法;许多具体的学术观点与学术讨论,都是由此方法派生的。进入八九十年代,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的阶级分析方法,开始回归到文人群体及个体的阶层身份的研究,不再使用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庸俗社会学的评论方式。同时海外尤其是日本学者关于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制度的研究,也被陆续地引入。至于将现实性、形式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相结合的论述方式,也随之自然地分解了。但现实性、形式主义作为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的评价标准,在后面的时期仍然被广泛地使用。

#### 四

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与上半期文学史的联系,还表现在对前半期的学术成果及学术权威的选择方面。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具体的结论需要通过详实的调查才能达成。一个初步的印象,是新文学派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在这个时期成为主流。上半期新文学派的学者,对古典文学研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胡适。但在这个时期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三十多年的胡适派实用主义统治在古典文学研究者中流毒很深,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干净。”<sup>⑤</sup>当然,胡适的一些文学史观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实际上还在发生影响。代之而起的,主要是鲁迅、闻一多、朱自清等人的影响。郭沫若也被认为是“最早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国古

①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99—200页。

②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第188页。

③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第189页。

④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第213页。

⑤ 吴晓铃、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体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代史和古典文学的专家之一”<sup>①</sup>。其中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影响更是决定性的。频繁地征引鲁迅的观点,在鲁迅观点的基础上进行阐述,可以说是这个时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撰写与作家、作品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视之为阶段性特征。

鲁迅是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的领袖,延安时期就已确立崇高地位。在五六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鲁迅的影响也是普遍性的,梅新林等人的《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第二章、第二节《鲁迅:古代文学研究新权威的树立》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sup>②</sup>。鲁迅在文学史观方面受刘师培、章太炎等人的影响,崇尚魏晋文章,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魏晋时代的社会风气与文学创作、以及建安文学、正始的阮籍、嵇康乃至陶渊明等,都有评论。所以,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界的权威地位,在魏晋文学研究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科学院版《中国文学史》在论述阮籍、嵇康反对礼教的问题时,采用了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这一说法。<sup>③</sup> 分析阮籍《大人先生传》时,也指出“鲁迅曾借用刘勰说的使气来概括阮籍的特色。”<sup>④</sup> 在论述陶渊明的时候,用较大的篇幅论述陶诗并非只有平淡,还有《咏荆轲》及《读山海经》《饮酒》等组诗中激越感情的表现,也是采用了鲁迅的看法。高校版《中国文学史》采用建安时代文学自觉说<sup>⑤</sup>,在评论曹操时,采用了鲁迅“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文风“清峻”“通脱”等看法。<sup>⑥</sup> 在评论陶诗的风格时,和上书一样,同样采用鲁迅的“金刚怒目”式的评论。<sup>⑦</sup> 同期的论文中,引用鲁迅观点,甚至主

要根据鲁迅的观点进行阐释的现象也很突出。如张志岳《论曹植的诗》一文在分析曹植的文学观念时,主要采用了鲁迅对曹植表面轻视文章、视其为小道的一段分析,还引用了鲁迅“帮忙文学”的说法,来分析三曹文学的不同特点。<sup>⑧</sup> 易润芝的《试论陶渊明》中说:“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来说,就更应该首先在思想上摆脱一切旧的影响,以清醒的、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思想方法,学习鲁迅先生在研究古典文学方面的‘知人论世’的治学态度。鲁迅先生告诉我们:‘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顾有全篇,并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因而也就激烈反对:取材,单靠选本;研究,专门摘句,片面发挥,抹煞全体的那种主观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方式。(《且介亭杂文二集:“招贴即扯”。“题未定草”(六)》)。因此,我们今天应本着鲁迅所指出的方向去努力,以期达到鲁迅先生所期望的,使陶渊明真正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sup>⑨</sup> 王瑶的《关于陶渊明》,也多次引述鲁迅的观点。<sup>⑩</sup> 结合其他各段文学史的情况,鲁迅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是鲁迅的经典地位的树立时期。

朱自清、闻一多在五六十年代的影响,也是构成当时学术思想的一个来源。夏晓虹为季镇淮《来之文录》所写的提要中指出:“以文学史研究为职志,而形成贯穿各篇的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是此书的鲜明特色。这一点在1949年以后撰写的诸文中更其明确。作者处理的尽管是具体、个别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却以全史的构建为旨归。其间隐含着继承闻、朱二位先师本

① 吴晓铃等:《十年来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体工作》,《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

② 梅新林、慈波、曾礼军:《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3年版。

③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第200页。

④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中国文学史》,第214页。

⑤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96页。

⑥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210页。

⑦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245页。

⑧ 张志岳:《论曹植的诗》,《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59—171页。

⑨ 易润芝:《试论陶渊明》,《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第172页。

⑩ 王瑶:《关于陶渊明》,《文学遗产选集》第一辑,第105—113页。



意之遗志的深心。作者不断回忆道:闻一多先生‘在遇害前几个月,表示要写一部唯物史观的中国文学史’(《闻一多先生事略》);朱自清先生‘主张考据批评的概念,显然是为构造中国文学批评史创造条件’(《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而作者把握数千年文学史的策略,同样得益于闻、朱二师。闻一多先生研究传统文学,开始于杜甫,‘由杜甫研究扩及全唐诗的研究,由唐上溯六朝、汉魏、直到古诗的源头《楚辞》、《诗经》’(《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sup>①</sup>关于闻、朱在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影响,也是一个可以专门研究的课题。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研究,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派愈成主流,属于旧学范畴的研究,相对来说愈显零落。

## 五

五六十年代有关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的研究,从整体上看,是有比较突出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倾向的。但凭借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养成的研究群体的实力,在诗人及诗作的研究上仍有不少实质性的推进,并且有些研究者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一些独立性。对此,吴云主编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有比较中肯的评价。该书比较尖锐地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受政治强烈干预的现象,认为在方法上是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的盛行。但同时指出,这时期“仍有人能够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比较科学、客观地研究古典文学,比如在有关曹操、蔡文姬、陶渊明的讨论中,都有部分学者不为风向所动,不管气势多么凶,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问题作出比较中肯的发言”。而在学术成果方面,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之外,“浦江清、余冠英、程千帆、逯钦立、缪钺、张志岳、詹鍈、胡念贻、王运熙等,在本时期也有水平较高的论著发表,使得本时期在学术一统化、学术政治化、学术运动化的大背景下,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尚有一些成绩可说”。<sup>②</sup>造成此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尚有成绩可说的主要原因,是三四十年代走上学术舞台的一批重要学者丰厚的学术功底与学术良知的作用。

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就是在新学术背景下,重新选择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经典,包括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方面。以前六朝诗选影响最大的当推沈德潜《古诗源》与王闿运《八代诗选》。《古诗源》反映了汉魏派的观念,《八代诗选》则是六朝派的观念。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影响、尤其是进入五十年代后政治及社会的新需求,重新选定经典自然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余冠英的《三曹诗选》《汉魏六朝诗选》这两部选集仍是以一人之力而成,对当时及后来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对这两种选本,以及《诗经选》《乐府诗选》与余氏主持的《唐诗选》,徐公持曾经这样评价:“余先生的几种诗歌选本,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可不要以为这只是普通的读物而已,从纯粹的学术眼光去考察,它们的质量是很高的。它实际上是将这几部作品选注当做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做了,所以他的许多学术心得、学术创见都融注进了这几部选本,使之具有一般选本少有的学术精品品格。”<sup>③</sup>看来余氏这几种唐前诗歌选本的学术影响,应该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史问题来讨论。1962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是另一个影响深远的选本。其中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选目主要由林庚主编,陈贻焮、袁行霈等参加。稍后1964年出版的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是一个系列的成果,魏晋南北朝诗歌部分也是由林庚起草选目,倪其心负责注解的初稿撰写。<sup>④</sup>后书的选编前言中说:“我们希望能尽可能选思想性艺术性都高的作品,同时为了体现中国古典诗歌全面的成就,以及历代诗歌流派的发展,也选了一部分思想性与艺术性有

① 乔默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② 上述两处引文分别见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3页)。

③ 徐公持:《记余冠英先生及其学术》,余冠英:《汉魏六朝诗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93页。

④ 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页。

所偏重的作品。”这应该是五六十年代古代文学作品选的一个普遍性的选择原则。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标准分开来,是五六十年代学术的思维习惯。艺术性来自审美,是具有古今相接的共同性的艺术标准。思想性则主要是时期性的。而注重诗歌流派的发展,则体现了丰富的学术积累。

五六十年代,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方面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其中王瑶《中古文学史论》与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一样,在八九十年代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被视为这个时期没有受左风影响、运用比较科学的知人论世方法的一个成果。<sup>①</sup>但在当时属于非主流的成果。并且此书属稿于1942年至1948年间,虽然出版是在1951年,但就学术史来看,此书是上半期新文学派中古诗歌史研究之殿军,并非新的学术体制的产物。王运熙有关汉魏六朝乐府诗的一系列研究,所开启的主要是乐府及其诗歌研究方面的实证性方法。由于他的研究开始于新的学术体制形成之前,其后五十年代的研究也基本是循着其原有的研究方法展开,采取着重于乐府制度的沿变、乐府歌诗产生时地等史实考证的实证性研究方法,所以与当时主流的阶级分析方法关涉不是很大。

逯钦立大概是这个时期在汉魏六朝诗歌方面用力最勤、实绩最大的一位学者。逯氏在三十年代就读西南联大时期开始研究乐府诗,并在罗庸指导下完成论文《相和歌词考》。1939年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确定研究课题为“校辑全汉魏晋南北朝诗”。随后陆续完成《汉诗别录》、《古诗纪补正叙例》等论文,并对《嵇康集》、《陶渊明集》进行集中的研究,撰写了陶渊明生平、里居与思想的相关论文。<sup>②</sup>其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其自叙,“校辑开始于四〇年,完成于四七年。”应该是解放前完成的一个成果。但作者自称从六一年春对旧稿进行整理,至六四年完成。<sup>③</sup>他的《陶渊明集》整理工作及附录的相关论文《关于陶渊明》、《陶渊明诗文事迹系年》,也是始于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完成。逯氏的研究成果,最

典型地体现了本文所强调的五六十年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与三四十年代的延续关系以及与八九十年代的接引关系。

## 六

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有一个不同于前后各个时期的特点,即主要集中在对重要诗家的研究,这与当时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中作家研究盛行的情况是一致的。这个时期比较重要的论文和专著,也都属于作家研究。并且,主要集中在建安曹氏父子、阮籍、陶渊明、鲍照这几位在当时看来思想性与艺术性能够统一的诗人。1969年,香港中国语文学社编辑《魏晋六朝诗研究论文》,选入了撰作于五十年代的十位学者的十一篇论文,大体上可以代表此期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论文的高度。具体题目如下:

余冠英《论建安曹氏父子的诗》(《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张志岳《论曹植的诗》(《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郑孟彤、黄志辉《试论曹植和他的诗歌》(《文学遗产增刊》第五辑)

萧学鹏《阮籍试论》(《中山大学学报(社)》1956年第4期)

张志岳《略论阮籍及其咏怀诗》(《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

易润芝《试论陶渊明》(《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王瑶《关于陶渊明》(《文学遗产选集》第一辑)

刘禹昌《陶渊明作品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9年第3期)

曾君一《鲍照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陈贻焮《鲍照和他的作品》(《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陈寂《鲍照诗歌的艺术特点》(《文学遗产增刊》第三辑)

① 吴云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第22页。

② 李思清、逯宏捷编:《逯钦立先生年谱初稿》、《逯钦立先生著述略表》、《逯钦立文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

③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后记”,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94页。

余冠英、张志岳和郑孟彤、黄志辉四位学者的论文,都是以曹植的生平与诗歌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此前,郭沫若在《历史人物》一书中专门写了《论曹植》一篇。可见五十年代关于曹植的研究,也形成过一个热点。各家论文对曹植生命后期遭受压迫,都有比较重点的分析,其意图在于揭示曹植取得诗歌艺术上杰出成就的成因。同时也都强调其在发展五言诗艺术方面的作用。这些论文,有时也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如张文强调曹植与人民的关系,在分析曹植前后创作的高下与曹植与曹丕的高下时说:“我们只要根据他前后不同的生活及其阶级关系去分析,也就可以分别理解何者该表扬何者该批判了。”但总体来说,这三篇论文,对曹植诗歌的研究是有所推进的。对一些传统的看法也有质疑,如张志岳对王夫之有关曹丕的评论表示质疑。张氏论文还正面地肯定了曹植在乐府诗方面的新的创造,指出其“运用各种题材与情志结合的创造,大大开启了以后诗人的创作道路”“曹植的诗无论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他的创造性,兼有华茂淳朴之长,他写下了不少精美的诗篇,对五言诗的基础的奠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他的辞赋像上文郭先生所列举的许多篇,的确是摹拟的痕迹异常显露,这也说明辞赋的没落,而发挥创造的天才很自然地要转到新兴的五言诗上去了”。<sup>①</sup> 强调建安以后辞赋的衰落与五言诗的兴起,是五四以来观察本段文学史的一个基本视点。

萧学鹏、张志岳有关阮籍咏怀诗的研究也有各自的角度。萧作较多地从创作方法方面论述阮籍,认为阮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并从其时代的黑暗、混乱与诗人对其的反映的角度来论述。具体分析阮诗艺术时,结合传统的比兴说,认为“‘象征’的运用是阮籍诗篇中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其运用艺术作品来进行斗争的一种有力武器”。将传统的比兴说与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也是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八十年代古典诗歌研究的一种现象。张作对阮籍

的咏怀诗从主题方面进行分类,这也是20世纪阮籍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

陶渊明是20世纪研究得最为深入的诗人。除了十分流行的传记式研究外,运用新的文艺观与研究方法来对陶渊明进行阐述,是本世纪陶渊明研究主要的展开方式。王国维、梁启超、鲁迅、朱光潜、陈寅恪,都以各自的文艺思想来阐述陶渊明的思想、人格和艺术。其中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说、梁启超的“自然说”、鲁迅的“论及全人说”、“金刚怒目”说、陈寅恪的“新自然说”、朱光潜的“静穆说”,都是陶学研究中影响深远的学术观点。<sup>②</sup> 由此可见,20世纪的陶学研究,是最能体现20世纪文学史研究的新学特点的一个领域,也是比较敏感地表现各个时期观念变化的研究对象。到了五六十年代,则主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人民性、现实性等概念来阐述陶渊明,或是肯定,或是否定。与三四十年代各家各自运用其文艺观对陶氏作出自由的阐释不同,这个时期的阐释是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下进行的。同样的,前期的个人化阐释,虽然不乏主观阐释的色彩,但从各自的角度契合对象的本质与特点,因此具有学术上的真值。此期的阶级性、人民性等概念,与对象之间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出现肯定或否定,或在否定的前提下有所肯定,或在肯定的前提下有所否定等各种理解方式。易润芝《试论陶渊明》一文肯定陶渊明是伟大的诗人,但陶的性格与作品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变化和发展的。以往的人多是抱着成见看陶渊明,使其失去本来面目。“所以,今天的问题,就还不仅要给予陶渊明一个正确的评价,还其本来面目,而且对目前存在一部分人中的错误看法,与封建文人所留下的残余影响,也必须予以批判和清除。”<sup>③</sup> 文章主要从阶级分析、人民性、现实性等观念出发,同时引用鲁迅的相关观点,批评当时张芝等人只围绕陶渊明是否忠于晋室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做法。同时认为《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作品并非“恬美静穆”或粉饰太平,而是体现陶对统治阶级

① 《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第159—171页。

② 具体介绍参见诸家的相关论文,及吴云《陶学百年》一文(《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③ 《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第172页。

的不满,具有现实性。刘禹昌《陶渊明作品的现实性与人民性》,如其题所示,主要是运用这两个概念来分析的。这篇论文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援引了传统的门阀士族与寒庶族、农民的阶层分析方法,而强调其对立。文中称玄言诗是“反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代表门阀士族的空虚生活与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陶渊明“能够不受这个文学潮流渐染,在文学创作中从事现实生活形象的描写,单就这一点而论,对于文学的发展,即具有进步的意义。”<sup>①</sup>论文主要从陶渊明作品中所揭示的积极用世、与当时腐朽政治的矛盾、参加农业生产后对劳动实践和认识的生活的具体描写、对贫困的生活现实的深刻反映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其现实性与人民性。这样的论文,在当时是属于正面性的。并且其中确实反映了宿学的思考,与传统的文学史论也有复杂的承接关系,比如否定玄言诗在南朝时期就已经是一种通识。八九十年代才出现对玄言诗的一些肯定性评价。

在陶渊明研究方面,1956年出版的王瑶《陶渊明集》,在编年与校注方面,也有不少切实的成绩。并且与王瑶一贯的研究风格一样,比较正面地接受鲁迅的影响,而与当时主流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定的距离。在《陶渊明集》的《前言》中阐述陶渊明及其诗歌时,主要沿承上半期的分析方法,没有明显地套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其对陶渊明阶层地位的分析,还是采用四十年代魏晋门阀与寒素问题研究的观点。

鲍照向来被视为东晋南朝庶族文士的代表,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下层,在五六十年的研究格局中最受重视。曾君一《鲍照研究》提出一个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的看法:“一般人说:由于隋唐的科举制度给予新兴士大夫阶层以参加政治的机会,才把南北朝势族官僚专政的局面根本转换过来。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新兴势力的抬头,不是科举制度的结果而是科举制度的起因。因此,它的抬头,不仅不在唐朝开科取士之后,也不在隋

朝开科取士之后,而在刘宋建国以寒人掌机要之初。”言外之意,因科举而走上仕途的隋唐寒素族士大夫阶层,其来历可以追溯到刘宋时代以文章才能而掌机要的寒庶族。这个观点无疑是富于启发性的。曾文强调鲍照与谢灵运作为新旧两种势力的对立,全文都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鲍照的思想与文学表现。这无疑是受到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尤其强调两者文学观方面的对立,甚至说“六朝是我国骈文和五言诗的极盛时代。作为新旧势力的代表的短兵相接,在刘宋朝里也就正式爆发”。<sup>②</sup>剔除阶级斗争式的思维方式,这篇论文在分析鲍照的寒素身份与其文学的关系方面还是比较深入的。陈贻焮《鲍照和他的作品》也着重从鲍照的寒素身份来研究其作品的现实性。文章认为鲍照并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真的是“下农”“末皂”,而是出身于贫贱的寒士家族。论文主要着重于鲍照在当时门阀社会中的不平遭遇,及其反映现实方面的勇气。<sup>③</sup>陈寂《鲍照诗的艺术特点》以《南齐书·文学传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魄。亦由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数句为根据,很细致地分析鲍诗骨气奇横、神采焕发的风格,并认为是来自建安风骨的影响。另外如鲍诗“善于描写奇异景物”“善于用简洁的句子写复杂的人事”“华靡艳冶”、富于音乐性及其受古乐府及当代民歌的影响数点,都能精辟入理。<sup>④</sup>该文完全摆脱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不简单地使用“现实性”“形式主义”等概念,而是纯粹进行艺术分析,这样的论文是当时少见的。像这样纯艺术式的研究方法,在当时应该还是有一些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虽然外在的政治干预空前强烈,但是由于同世纪上半期学术研究的丰富积累,尤其是具有一批学术功底深厚的研究者,所以总体上讲,学术仍在进展,仍在有效地积累。进入新时期以后的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整体上看,还是在扬弃五六十年代

① 《吉林大学学报》,1959年第3期,第87页。

② 曾君一:《鲍照研究》,《四川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③ 陈贻焮:《唐诗论丛》,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1—432页,原载《文学遗产增刊》1955年第一辑。

④ 陈寂:《鲍照诗的艺术特点》,《文学遗产选集》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3—237页。

的研究成果与方法的基础上发展的。由于学力的限制,本文对此期研究的评述仍然是粗疏的,并且

有不少挂漏。笔者的意图,并非要形成定论,而是提出问题,引起同仁的研究兴趣。

##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the Study Mad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on the Poetry from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Qian Zhix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mad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on the poetry from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was a continuity of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itiated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 a new political and academic system, with some changes in the self-positioning of the researcher groups and the mode of academic production. As to the specific academic contents, the study made in the 1950s and 1960s also inherited a lot of concrete viewpoints from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lthough such comparatively coagulated models as class analysis, realism and formalism we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udy, it show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onvergence of the old and new methods of research. At this time, the new school of literature completely became the mainstream and Lu Xun's works were established as classics. In spite of such factors as philistine sociology and mechanism in philosophy 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were many substantial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ies of some specific poets and poetic works,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s for the stud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Key words:** 1950s and 1960s; poetic study during the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ode of academic production; self-positioning of a researcher group